

生态文明应当成为一种文化观念

谢小军

环境治理毫无意外地成为今年两会关注的一个焦点。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称：“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李总理的报告反映了民众的心声，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威胁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每个人的幸福，我们可能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从普通公众到社会精英，都持续、强烈地释放着对环境污染的焦灼情绪，期待政府能够采取有效措施还人民以洁净的空间。

两会的聚焦，全民的关注，再一次让我们得以反省和反思环境保护问题，并认真审视那向著名的论断：“我们不是从我们的先辈那里继承了

这个星球，而是从后代那里占有了这个星球。”人类文明是独特的，地球上只有人类是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而其他任何生命都是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正是这种无以伦比的能力使人类的生存空间急剧扩张。文明扩展的代价是自然生命的消逝，这个过程带给人类环境、资源和疾病种种问题。古往今来，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活动充满欲望，它虽使人类世界显得生机勃勃，但欲望支配下的价值判断远非理性，这给人类的未来带来太多的不确定甚至阴影，从而制约人类文明所能走过的里程。

一些睿智的学者指出，需要从宽广的视角来看待环境等人类发展问题。他们意识到，不

能简单地以技术去解决这些问题，却不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和欲望。这些问题实际上是由社会和文化决定的，从根本上讲需要社会和文化问题的解决办法，而非仅仅做出一些技术性的修补。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较西方发达国家更为突出，生态文明建设是解决环境等发展问题的重要选择。生态文明强调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它不光是一种发展模式，也是一种价值理念，它的核心包含着生态伦理——对人的道德对待大自然，关心人与所有生命的关系。

生态文明不应是应景的口号，而应内化为

民众的思想观念，成为一种集体意识，成为当代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但遗憾的是，生态文明还远未成为民众头脑中的主导性思想，浪费、奢侈、不环保等行为还普遍存在。由此亦可看出生态文明改变人的心灵的迫切性，生态文明理应为高尚行为和先进文化的符号。

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写道：“技术变革能提高生产率和生产水平，所以很受欢迎，且很快便被采用；而社会变革则由于要求人类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调整，通常会让人感到受压迫和不服，因而也就容易遭到抵制。”这就解释了当今社会的一个悖论：虽然人类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知识，变得越来越能按自己的意愿去改造环境，但却不能使自己所处的环境变得更适合于居住。”

习惯的改变、意识的改变、文化的改变都是十分困难的，生态文明成为一种文化观念是一个艰巨的过程，但它是我们民族面向未来的必然选择，因此只能勇往直前，别无他途。

来。但很遗憾，在这场公众高度关注的讨论中，他们的声音缺位了，或者因为不如两派争论那样吸引眼球而被公众忽略了。在权威信息的真空下，本就偏执极端信息的公众自然无法作出理性选择。

崔永元的纪录片让观众看到了转基因在美国的接受情况，也应该让专业人士看到公众对转基因知识的理解程度。纪录片带来的转基因关注热潮，应该成为专业人士开展转基因科普的契机。比如纪录片中提到的草甘膦是什么？Bt蛋白确实是毒素吗？各国的标识制度有什么区别？回答这些问题，需要高度的专业知识，是发挥科研人员优势的好机会。很欣慰，农业部对崔永元的调查作出了初步回应。但这种回应还远远不够。要让公众对转基因形成客观的看法，需要专业人士持之以恒、富有亲和力的知识普及，也需要客观平和地告诉公众一项新技术潜在的利与弊。

转基因争论需要回归专业化和理性化

徐玢

两会前夕，崔永元在网上公布了他去年赴美国调查转基因接受情况的纪录片，引来关注无数。这种关注在延伸到两会的同时，也引来诸多批评：崔永元的调查不够科学。

如果拿出做科学论文的精神，小崔的调查确实有些问题。比如最明显的，有人说科学家通过发表特殊言论获利，政治干预了科学研究。这些说法缺乏事实依据，充满了阴谋论的气息。作为资深媒体人的崔永元，肯定清楚这些言论不能作为反对转基因技术的证据。但这些片断还是出现在了片子中，因为崔永元提供给公众的，不是一个普及现代农业技术的科普片，而是一个介绍美国对转基因技术和作物接受情况的纪录片。从这个角度看，崔永元的

工作是合格的。纪录片备受争议的原因，是片中美国公众接受或反对转基因的理由显得片面、不够科学。也许有人会说，崔永元提供的确实是一个合格的纪录片，但这些都够科学的言论有可能引起公众对转基因的恐慌。我想，这恰恰为转基因提供了一次绝好的科普机会。

纪录片展现的是美国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抛开转基因的是是非非本身，我们会发现一些美国公众对转基因的判断是如何缺乏科学性，他们在决策中多么容易被极端信息所左右。把目光投向国内，会发现情况与纪录片中的描述很相似：公众选择相信或者拒绝转基因的理由不够严谨，甚至有些极

端。这与公众获取相关信息的来源分不开。平面媒体以及网络空间中，支持转基因和反对转基因两派的争论由来已久而且略显极端，这是公众关于转基因信息的主要来源，也是崔永元展开转基因相关调查的原因。但大部分公众没有精力也没有机会展开这种调查，只能在两派激烈的争论中看个热闹，一如半解地复述争论中的一些观点和证据，然后选择相信某一方。这不应该是事关公众日常生活的讨论的本面目。

在工作中，我曾有机会接触从事转基因技术研究的研究人员，他们对自己研究领域的看法既专业，又不像两派争论中那样绝对和极端。他们应该是公众获取转基因知识的重要

会前会后，你们可以是三百六十行，一旦开会你们就是人民的思想与良心，喉舌与眼睛。

两会代表委员在北京审议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民也在“审议”着两会。

两会体现了共和国的最高国家权力和最广泛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全国人民看两会要看的是：天下大事谋篇布局，牵“一”动“百”举足轻重，国计民生社会发展，创新驱动文明传承……

两会的代表委员们肩上担负着13亿人的期许，和荣誉并重的是面对13亿人的回应。看到了，许多代表委员的提案之重，情怀之诚，眼光之远，思虑之深，发言之切，期盼之急，都会令外间动容。

与治国者议、同百姓们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最大的红利是改革，最迫切的任务是深化改革！仰头望天，阴霾蔽日，告诉

我们工业结构的调整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低头看地，地价飙升，靠卖地过日子的政府已经迫近红线了。高居的房价，降吧会带来房地产商捆不住了，降吧可能又会带来相关产业的集体滑坡；低廉的粮价，涨吧同样收入低廉的亿万老百姓受不了，不涨吧每亩只有几百元收入的农民凭什么还要伺候？！

还有不缺乏大编缺大师的大学；还有创新驱动发展谁来驱动创新的科技；还有娱乐至上道黑成风戏说历史黑白难辨的文化；还有一代人“宅”与就业难题，二代人的穷与富的差距，三代人的生与限的选择，六十岁以后退与作的摇摆……

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当李克强总

理提出“三个一亿人”时，亲爱的代表委员们，你们感觉到没有，这是中华民族前无古人的惊世壮举！

敢问当今世界，“一策动三亿，宏图管百年”的大计，还有哪个国家可以行之？参与这样的决策，你们按下表决器的手指，就是指点江山创造历史啊。这“三个一亿人”中，应该大都是普通农民和老百姓，这是为普罗大众实施的伟大工程。当真的实现一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了城镇，当真的改造了一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当真的引导了一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时，那时的中国该是一个何等美好的天地呀！

当然，拉风抖范儿的明星们永远是赏心悦目的靓丽风景，“黑白白马，梦蝶化蝶”式的学者之争依然口吐莲花，名门望族巨商豪贾代表

审议两会

着荣誉也代表着财富，就连靓女俊男的服务人员也谋杀了无数记者的“菲林”……可以有花繁，忙中难得轻松；可以有轱辘，会心莞尔一笑；可以有难推，权当雅俗地气；可以有戏言，解嘲透着幽默。

然而，两会会戏但不是春晚，两会有料但不是猎奇，两会有梦但不是空想，两会有谋但不是空论。会前会后，你们可以是三百六十行，一旦开会你们就是人民的思想与良心，喉舌与眼睛。

开会期间不能玩手机。



丁列明代表：简化审批让新药更快“见效”

本报记者 刘晓莹

■两会企业家说

“我国负责新药审批的只有120人，但每年等待审批的项目却多达6000多个，人这么少，工作量却如此之大，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我国的医药审批周期这么长了。”谈到影响我国制药行业创新成果转化效率的最大难题，浙江贝达药业董事长丁列明代表开门见山。

“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两个关键词：深化改革和创新。这两个关键词对我们企业家而言，感受很深。”丁列明说，“改革是目前医药行业管理面临的首要任务，比如要

提高审批效率，就是要做到简政放权。去年我也谈过此类话题，虽然有一些进步，但是和我们企业的实际需求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丁列明介绍，贝达药业研制了10年的治疗肺癌的新药，上市两年多来，实现销售收入8个多亿，缴纳税款2.4个亿，不但打破了进口产品的市场垄断，还以更优惠的价格让中国更多的晚期肺癌患者用上了理想的改善药。“由于这个项目是科技部的重大专项，我们走了‘快速通道’，审批的过程节省了11个月。”丁列明说，据了解，如果按照现在正常的审批流程，这个周期要延长整整一倍。

“行政审批的效率和速度直接影响着我国医药行业的研发与生产，特别是在医药创新方面，可以说关系到药企的生存与发展。”丁列明提议改善我国现行的新药审批制度“权力过于集中、环节多、行政人员有限”等现状，比如将新药项目审批移交给省一级层面来处理。

“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让社会资源来发挥作用，帮助我们的行政部门完成对技术的审批。”

购买专业的审批服务，可是这钱从哪里出？对此，丁列明表示：“从企业的角度出发，我

们也希望通过增加收税，来为国家购买专业的医药审批服务‘买单’。如果政府愿意用这个钱和资源去引进专业的技术服务，加快审批周期、提高成果转化效率，那么我们企业不但愿意出这个钱，而且觉得这个钱出的很值！”

“我们还实行了后续的免费给药项目，目前已有7000多个病人拿到了终生免费用药的资格。”聊到免费给药项目，丁列明很欣慰，“作为企业家，我感到创新是非常有前途、也是非常有力量的，它不但可以实现经济效益，还能够实现社会效益——我们希望可以创造的效益来得更快些。”

（科技日报北京3月6日电）

作为互联网产业界的大腕，李彦宏没有忘记当下很时髦的“宝宝”，“互联网金融也是一样，虽然刚刚开始，但是金融不涉及到物流和配送，所以非常适合网上来做。所以无论银行、证券、保险、基金都在积极的向互联网靠拢。”

记者了解到，国外创客的繁荣离不开网络众筹融资的给力。而包括众筹融资、P2P贷款、余额宝、微信红包、嘀嘀打车等与互联网金融相关的衍生创新，也激发了空前的热议。

杨凯生委员，作为金融行业的权威人士，他对互联网金融的解读总能代表一种导向，所以堵他的记者完全不比李彦宏这边少。

“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对提高一些金融交易活动的效率，扩大金融服务的普惠面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也要看到，互联网金融确实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比如说，是否允许这些互联网企业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存款？是否允许互联网企业承担信用风险？如果从事贷款业务，承担信用风险，是否需要像传统的金融机构一样，有坏账的拨备？如果说短时间里监管没有跟上，还情有可原，但时间长了，监管机制还是必须跟着完善起来。在这个层面上，放任发展不仅存在市场风险，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精神。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要加强监管。”他说。

“问题总是存在的，包括几位也讲到，比如金融方面会不会有风险？肯定也会有，但是注意到有这个风险，那这个风险就好办。”陈锡文委员虽然主攻农业，但也持相同观点。

（科技日报北京3月6日电）

何委员别委屈

杨雪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何香久近日很伤心。他的提案是“给基层公务员逐步涨工资”，但被媒体报道成了“给公务员大幅涨工资”，结果惹得一身指责谩骂。也许是本意被曲解，点燃了公众与公务员群体的对立情绪，让何委员受了委屈。但何委员不必委屈，相信就算基层公务员涨工资的意思得到了正确的传达，结果仍然是听取骂声一片。

不可否认，基层公务员工资确实少得可怜，一线岗位的工作也确实辛苦，而且不论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到基层，就整体公务员队伍而言，与他们自身的投入产出相比，与大多同龄的其他职业者相比，与日益增长的物价水平相比，工资确实偏低。正如全国人大代表陈伟才所说，同样拿20多万的薪酬，难道一个部长的职责与贡献还不如一个企业里的部门经理？

如此，公务员涨工资，合情且合理，凭何委员一份提案本不足以掀起众怒。而真正刺痛公众敏感神经的，是一种隐藏在公职身份背后，无处不在、见缝插针的权力寻租空间。

信息消费重在“弥补裂痕”

王晓松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到了发展信息消费，这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信息产业而言是一件大好事，同时也十分契合当前中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发展理念。

据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网民规模超过了6亿，互联网行业的年均收入增长连续保持在40%以上。但也有指出，无论是在普及率、产业渗透率上，互联网在中国都存在着一分为二现象。比如，互联网普及率已接近50%，网民的组成主要是学龄人口和非农业劳动人口，而幼儿、老人和农业人口则大部分还处于“与网绝缘”的状态。还有，目前互联网在中国的应用主要是在商业领域，像电商、金融、网络游戏等，但在教育、医疗卫生、公益福利领域，则明显的冰火两重天。由此，网络似乎正在将中国的人群与产业割裂为泾渭分明的两部分。

除了网络的割裂之外，也存在着“割裂的网络”。这些企业，只要是成为互联网发展的热点，无论是社交类、金融理财等等，都可以看到竞争对手之间彼此封杀、殊死较量的景象。就像不久前刚刚火爆一时的打车软件之争，除了比拼高额补贴之外，更是通过封堵对方的接入端口为手段，来争夺用户。如此一来，每个大型互联网企业都把自己的一套体系作为发展的终极目标，带来的是用户必须选边站队，而难以舒服地享受便捷与优惠。

网络的割裂也好，割裂的网络也罢，都是我们下一步发展信息消费必须面对的大问题。网络的割裂，意味着信息消费规模扩大的难度将逐步加大，要想把本来未接触过网络的人群纳入到信息消费中来，必须要推出更多的符合这些人群的消费产品。同时，针对现有的消费人群也要进一步创新消费方式，尤其是推动信息消费向商业之外的更多领域进行扩展。

而对于割裂的网络，可能还不单单是一个如何规范的问题。实际上，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信息产业之所以大踏步地发展起来了，就在于市场赋予了企业发展的自主权，带来了充分的竞争。就像今年两会上有政府官员回应4G资费居高不下时所说的，降低价格最终还是要靠充分的市场竞争。如果为了“规范”而加大政府的干预，就会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相悖。产业发展的动力，归根结底还是在市场的竞争。另外上，还要充分地相信企业在规范企业发展的自我调节作用。企业很清楚，过度的竞争造成的是两败俱伤，甚至是渔翁得利。一个成熟的企业，绝对不会为了竞争而不惜一切代价，而是去寻求一个双赢的策略。当然，这里也不能完全排除政府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通过规章制度等政策性手段，设立产业发展的红线，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种行政性的干预一定要慎之又慎。

发扬首创精神，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

（上接第一版）

此外，卓越创新中心还兼具“重大成果的发源地”与“杰出人才的聚集地”的功能，即聚焦重要前沿领域方向，长期持续攻关，不断取得重大创新突破，不断形成集群优势，凝聚并稳定支持最具创新活力的优秀个人和团队，不断造就科技领军人才和尖子人才。

白春礼说，以“四个率先”为统领建设一批卓越创新中心，就是希望其成为中科院最具代表性的学术高地，达到国内同领域领先地位，成为同领域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特色鲜明、独树一帜的世界级研究中心，在事关我国全局和长远发展的战略重点领域成为领跑者，在可能发生新科技革命的新兴及前沿方向上成为开拓者。

1月15日，白春礼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亲自为新成立的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卓越创新中心揭牌。该中心主要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设，主要参与单位有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半导体研究所。中心以中科院在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领域已取得的领先优势为基础，通过机制体制改革，凝聚国内该领域最优秀的科学家团队，用5—10年时间，建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和重要国际影响力的人才培养和聚集高地，科研高地和技术积累高地，取得一批原创性的重大科学成果和关键技术突破，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关键核心技术，并赢得主动权作出重大贡献，成为先进科学思想和前沿研究方向的开创者、新一轮量子科技革命的引领者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摇篮。

目前，该中心已取得一系列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原始创新成果，使得量子信息技术成为我国极具特色的优势研究领域。

“为了保证卓越创新中心的建设，中科院做出了一些新的政策制度安排，给予倾斜政策和激励措施。”白春礼说，首先中科院赋予卓越

（上接第一版）利用航天风洞设计技术转化开发的烟气脱硫成套工艺及装置，可以有效控制电厂、炼油厂排除的工业废气……

但张建恒指出，我国航天科技成果在民用领域转化的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研究显示，航天产业的直接投入产出比约为1:2。如果算上对相关领域的辐射带动，欧美国家约为1:7到1:14，我国尚有差距，目前在1:7至1:10的范畴。美国航天科技成果转化率达80%，欧洲发达国家一般在50%左右，而我国目前刚刚达到10%。

创新中心必要的科研管理自主权，包括：科研活动组织管理改革试验权、具体研究方向设置的调整权、课题与经费的调控权、人员管理自主权、工作绩效考核权。允许卓越创新中心根据自身特点，结合承担的重大科技任务，设计科学可行的治理结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

其次是加大对优秀人才的支持力度。在卓越创新中心试行“中科院特聘研究员”计划。其中，“特聘杰出研究员”重点支持中科院具有国际影响力、代表世界一流水平、主持重大科研任务、具有领军才能、取得重大成果产出的领军人才。“特聘青年研究员”重点支持中科院具有很强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不超过45岁的青年拔尖人才。

第三是给予个性化的政策支持。为解决人员经费不足的突出矛盾，按照卓越创新中心全时核心骨干人员的规模，给予人员激励经费。在整合现有资源、盘活存量资源的基础上，根据卓越创新中心需求，通过人才计划、条件平台等现有各类渠道予以倾斜支持。

第四是严格评估、动态调整。对卓越创新中心实行周期性评估，以独立第三方专家、国际评估为主。每2—3年进行以诊断评估为主要内容的中期检查。每5年进行综合评估，评估合格的继续支持，评估不合格的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能达到要求的予以摘牌。

白春礼特别指出，卓越创新中心不只是中科院的中心，要加大开放力度，开放平台，与高校、企业和其他创新单元协同创新，促进我国科研事业跨越式发展。他强调，建设卓越创新中心是一项新课题，中科院应充分发挥首创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务实创新、开拓进取，通过建设中心，带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改革创新，早日实现科技跨越发展、建成国际一流科研机构。（科技日报北京3月6日电）

张建恒说，该集团公司累计拥有专利数千件，仅去年申请的专利就超过5000件。

此外他透露，该集团公司2014年将实施以高分二号、嫦娥五号试验器为代表的16次宇航发射任务。确保载人航天空间站工程、探月工程三期、各类应用卫星等型号研制顺利推进。其中，高分二号卫星投入使用后可为国内各用户提供高精度对地观测数据，在卫星应用方面将起到重要示范作用；嫦娥五号试验器任务将验证探月三期采样返回关键技术。

“互联网是上天赐给中国的机会”

——全国政协委员热议互联网新业态

本报记者 张晔

■两会声音

“您能不能谈谈创客文化？创客文化！”“什么？什么是创客文化？”在嘈杂的记者提问面前，李彦宏皱了皱眉头，眼神中带着疑惑盯着台下发问的科技日报记者。

16点10分，当主持人宣布本次记者会结束，台下数百位按捺不住的记者几乎都从座位上蹦

了起来，举着话筒、相机一路快跑冲向主席台，包括李彦宏在内的几位委员被迅速分割包围。

“就是利用开放硬件和互联网把各种创意变成产品。”

“嗯，好啊！”李彦宏听了科技日报记者的解释，似乎明白了，脸上表情也迅速舒展开来。

“这也是互联网改变制造业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当年的大腕——摩托罗拉、诺基亚都

完蛋了，一个成立才三年的小米成功了，说明互联网思维可以改变很多产业，包括制造业。”

“百度打算介入吗？”记者问。

李彦宏显然不打算久留，问题是无穷尽的。他左右看了看，眼神中有一种“快来解救我”的电波射向了旁边的工作人员。结果，当然是顺理成章被保护离场。

但是，他在记者会上关于互联网经济的观点，还在许多记者嘴上反复嚼着。

“传统产业本身的从业者，他们真正拥抱了互联网思维以后，会去提升现有的运营的效率。”

“最近打车，不会用智能手机打车软件的人，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出去吃个饭也好，唱个歌也好，看个电影也好，全部可以通过网上来完成。”

李彦宏的每一句话对在座的记者而言都非常好理解，接地气！



3月6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记者会。图为会后，李彦宏委员接受记者采访。本报记者 洪星摄